

蒙古族经济发展史

阿岩 乌恩 著

远方出版社

前 言

本书是从历史的角度探索蒙古族经济发展规律和特点的一部专著。

蒙古族曾与北方的其他游牧民族一道，创造了独特的游牧文明，为世界文明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蒙古族继承了北方游牧文化的传统，并与中原农耕文化相融合，使我国多民族文化更加多姿多彩。蒙古族也曾贯通“欧亚大陆桥”，融汇欧亚文化，推进了东西方的交往。但是蒙古族单一的经济类型持续了漫长的时间，草原游牧经济的脆弱性长期没有得到改变，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经济的总体水平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蒙古族经济的发展在很多方面都需要认真反思。

少数民族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少数民族的利益所在，也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所在。了解少数民族经济的历史，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关系的认识，促进民族问题的解决，加快少数民族经

济的发展。

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指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① 中国共产党没有照搬外国的模式和经验，而是创造性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采取了其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以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五十多年来，蒙古族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奠定了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之际，我们希望将这样一部历史展现给大家。

从体例上看，经济发展史与经济史有所不同。经济史研究、探讨经济发展与衰退的性质和原因，以及发展的阶段和类型。经济发展史则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探讨经济变化的一般规律。历史研究不是各种事件的简单堆砌，必须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研究蒙古族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弄清楚蒙古族经济发展的基本史实，还应研究基本规律、基本特点等内容，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否则难有科学意义。

对于蒙古族历史的研究，已有很多从社会、政治、民族关系、民俗、军事等方面进行探讨的著作，然而，迄今还没有一部研究蒙古族经济史的专门著述。尽管将蒙古族经济问题引入蒙古学研究领域由来已久，在这方面，许多学者进行了辛勤的探索，在浩如烟海的蒙汉文史料及外文文献中披沙沥金，填补

^①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163 页，人民出版社，1994。

了大量学术空白。还有一些学者自觉而敏锐地将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的研究推向了蒙古学和经济学边缘研究的前沿。但是，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在资料建设和方法论方面，都有待于完善。

《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的编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这首先应归功于前辈和同行的辛勤劳动。我们的任务是吸取前人的各项研究成果，在考证、鉴别、扬弃、补充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开辟一些新的领域，在全面研究之前，设法弄清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的大体轮廓。

衡量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要有一个全面评估这种经济活动的尺度，才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财富的积累状况和人们的收入水平。评价一个民族的经济的发展，除了史学家所关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以及重大的生产技术方面的突破。遗憾的是，历史上的经济资料与非技术变革和非人口变动的社会、政治、文化资料相比，不是残缺不全，就是准确性可疑。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尽可能地拓宽研究的领域，调整视角，从社会发展史、民族发展史、民族关系史、社会民俗史等方面发掘史料，吸取素材，丰富知识。

蒙古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与各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祖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感，以及长期形成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是由相互关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决定的。因此蒙古族经济史侧重于一定的地域，带有区域经济的特点，主要研究蒙古族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

全书的结构布局是按断代史的体例安排的，分期与我国采用的历史分期也大体一致。这种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经济史，因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和阶段并不完全决定于社会政治事件和朝代的更替。但是，由于蒙古族经济史资料严重缺乏，加之其他原因，我们只得采取这种结构布局与历史分期。这一缺憾，只有留待以后去弥补了。

阿 岩

1999年9月

目 录

1

第九节 蒙古统治者对中原及被征服地区的经济政策	
.....	(104)
第三章 元代蒙古族经济	(112)
第一节 蒙古社会制度	(114)
第二节 蒙古社会经济关系	(120)
第三节 畜牧业及狩猎业	(125)
第四节 农业	(134)
第五节 手工业	(140)
第六节 城市建设	(147)
第七节 元代的交通和驿站	(151)
第八节 商业	(156)
第四章 北元时期的蒙古族经济	(161)
第一节 蒙古社会制度	(163)
第二节 蒙古经济制度	(170)
第三节 畜牧业	(175)
第四节 狩猎业及野生资源开发	(184)
第五节 农业的发展与半农半牧型经济的形成	(187)
第六节 手工业与城镇建设	(193)
第七节 商业	(199)
第五章 清代蒙古族经济	(205)
第一节 蒙古社会制度	(206)
第二节 蒙古经济制度	(213)

第三节 畜牧业·····	(218)
第四节 农业·····	(226)
第五节 商业·····	(239)
第六节 手工业·····	(252)
第七节 寺院经济·····	(254)
 第六章 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的蒙古族经济 ·····	(266)
第一节 西方列强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渗透及掠夺·····	(268)
第二节 传统畜牧业的衰落·····	(280)
第三节 资本主义萌芽·····	(293)
第四节 蒙古族传统经济的变革·····	(299)
 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蒙古族经济 ·····	(306)
第一节 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经济政策·····	(307)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及“一五”计划·····	(316)
第三节 “大跃进”的冲击及调整成效·····	(327)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的干扰·····	(346)
 第八章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蒙古族经济 ·····	(356)
第一节 纠正“左”倾错误及农牧区体制改革·····	(357)
第二节 投资与建设管理体制·····	(381)
第三节 发展巨大 成就辉煌·····	(388)
 后 记 ·····	(399)

第一章

北方游牧文明与蒙古族族源

蒙古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蒙古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它与我国各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蒙古族与祖国各民族之间形成了相互认同感，以及长期的和睦关系。

蒙古族在历史上经历了罕见的大规模扩张，在半个多世纪中完成了“大一统”的空前伟业，并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在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蒙古族在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功效错综复杂，其积极与消极意义相互交织，并且潜入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蒙古族是古代北方游牧经济、文化的集大成者，因而，其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无不具有游牧特征。蒙古族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面对无数的艰难险阻，总是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毋庸置疑，蒙古族的历史就是与接踵而来的各种艰难困苦进行斗争的

历史。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现在我国的蒙古族总人数为 480 多万（1997 年），其中，370 多万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占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的 16.2%，占全国蒙古族总人数的 77%。其余多聚居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及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还有少数居住在北京、河北、河南、四川、云南、宁夏等省、市、自治区。

目前，蒙古族绝大多数居住在东亚和中亚各国，在西亚、南亚和欧洲也有一些蒙古族混居于其他民族之间。蒙古民族的这种分布都是由于历史上多次民族迁徙、民族征服以及社会变动等原因造成的。实际上，现今世界各国绝大多数是多民族组成的，单一民族成分的国家很少，民族分布与国家疆域不一致是很普遍的现象。

第一节 游牧经济与游牧文明

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域是古代游牧民族诞生的摇篮。

有关这一地域人类文明的进程，考古学家通过辛勤的劳动，为我们列出了如下的时间表：

大窑文化(内蒙古呼和浩特)、萨拉乌苏文化(内蒙古伊克昭盟)、扎赉诺尔遗址(内蒙古呼伦贝尔盟)^①以及蒙古国木伊勒延阿姆遗址、隆县遗址、巴彦温都尔遗址、奥特聪满特遗址、包格德遗址的发掘和整理^②,证明该地域是原始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远在旧石器时代就已遍布人类活动的足迹。时间距今约70万—1万年。

在7 000—5 000年前,是新石器文化成熟和繁荣时期,丰富的出土文物和人文遗址,表明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诸方面达到了飞跃性的发展:首先,颇具规模的住居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凉城岱海,^③蒙古国敖包奥特、杜朗乌苏及克鲁伦河沿岸遗址^④),表明人们的生活已由半游动式完全过渡到定居化;其次,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再次,猪、狗、羊、牛、马等动物已驯化,畜牧业在人们生活中也占有适当的比例;最后,玉龙、祭祀遗址、陶俑(红山文化)、护身符、在死者身上撒赭石粉(蒙古国诺罗布勒乌拉遗址),说明当时的人类已形成比较系统的宗教观念。

公元前2 500—公元前1 000年间,蒙古高原及其边缘地区步入了青铜器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了社会各领域的变革。首先是社会制度由平等的氏族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墓葬中随

① 王大方:《内蒙古自治区的重大考古成果综述》,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1),第55页。

② A·诺夫哥罗德娃:《蒙古的考古发现与古代史问题》。见《考古学参考资料》(1),第60—6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③ 王大方:《内蒙古自治区的重大考古成果综述》。

④ A·诺夫哥罗德娃:《蒙古的考古发现与古代史问题》。见《考古学参考资料》(1),第60—61页。

葬品的多寡证明了贫富差距业已形成；其次，语言、习俗、宗教信仰、衣食住行等在特定的群体中已规范化并趋于稳定，古代民族已经产生；再次，马匹的广泛使用、车辆的产生以及随葬品中家畜数量的增多，说明以游牧为形式的古代畜牧业已成为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蒙古高原进入了铁器时代。

按照考古学家们的解释，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种认识：史前的蒙古高原并不是文明的“荒漠”，作为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其文明的发展与世界各个地区大体是同步的，从大窑的石器采制场到兴隆洼住居遗址，从北曾赫尔洞穴壁画到阴山岩画，从喀喇沁右旗东山祭祀遗址到蒙古高原腹地的石棺文化，从翁牛特三星他拉的玉龙到鄂尔多斯青铜器……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先民们闪光的智慧和坚韧的探索精神。

考古资料说明，蒙古高原的畜牧经济是在史前的原始采集、狩猎、农业和家畜养殖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最终在4000—3000年前得以确立。那么，对于以游动为特征的特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地位、贡献等问题，应如何客观评价并予以定位，是一个看似简单，但操作难度较大的课题，但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得到充分发展的今天，各个学科的成就为我们客观认识游牧业，澄清数千年来人们由于地理的、民族的、政治经济的、文化的原因所造成的模糊或错误的认识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游牧业是特定社会自然条件下人类的生存方式。翻开世界地形图，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蒙古高原可以做出如下描述：海拔平均约1500米左右，东有大兴安岭山脉，西有阿尔泰山脉，

南为阴山山脉，北为肯特山脉，山脉之间形成内陆河流、湖泊和盆地，绿地多分布于山脉两麓近河湖地域，沙漠面积占该地理单元面积的30%强，主要分布于东、南部地区。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蒙古高原大部分地区属大陆性温带草原气候，季节变化显著，春秋两季短促，冬季长，夏季短，无霜期大约从6月到9月，只有90天~120天，季节、昼夜温差大，如北部地区季节温差在80℃之间。全年半数以上的时间笼罩在高气压之下，降水量很少，年平均在120毫米~250毫米之间，且多集中在七八两个月。应当承认，同形成种植经济的气候温暖湿润的黄河平原（华北平原）、恒河平原、尼罗河三角洲相比，对于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先民而言，蒙古高原的生存环境是险恶的。人们在与大自然抗争的数万年中，不懈地摸索着最佳的生存方式。考古成就证明他们曾先后尝试过采集、狩猎、定居式农业，及与之并存的家畜饲养等生产方式，最终选择了游牧业，展现了人类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适应能力和伟大的创造力。

根据古人的记载以及近现代的调查报告，我们可以对游牧业的生产方式作一个大体的复原。

牧人根据指定的范围，将可利用的牧场分作夏营盘和冬营盘。夏季牧场多选择临近水源、地势平坦、通风好的地点，既便于家畜饮水，又可以减少蚊虫的骚扰；选择冬营盘的首要前提是考虑水源，在正常的年份，如果有适量的积雪，牧人可以驱赶着牲畜深入干旱草原腹地，选择植被茂盛、靠山向阳的谷地、盆地安营，牲畜可以依靠舔雪食草过冬。若遇上“黑灾”——冬季无雪或降雪极少，冬营地的安排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只能在靠水源（河流、湖泊或井）的地方扎寨，对牧草的状况无

法作更多的选择。

一年中每个牧户的搬迁次数，视牧草的状况而定，牲畜较少，植被较好，搬迁的次数就相对少一些。在正常的年份，一年有两次大的搬迁，农历五月份前后迁往夏营盘，十一月份前后迁回冬营盘。在此期间，还要进行8次~10次短距离的迁移。19世纪末的喀尔喀牧民一般移动距离在50公里~60公里之间。^①本世纪50年代，阿拉善牧民平均移动距离在10公里~15公里之间，最远的不超过30公里。^②由于清政府严令蒙古地区牧民不得越旗放牧，所以上述数字与清朝以来形成的制度和习俗有关，古代牧人的游动距离可能会更大一些。很多人将游牧理解为牧民对自然界的绝对服从，这种认识是偏颇的。诚然古代任何一种类型的自然经济（畜牧业、农业和渔猎业），对自然环境都表现出极强的依赖性，但它并没有妨碍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如果说游牧的首要目的是不断选择水草丰美的牧场，但其中也蕴含着古代牧人们保护资源、维护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自觉意识。具有草原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不同的家畜有不同的食草习性，牛、马、绵羊喜食禾本植物，山羊、骆驼喜食蒿类和盐性植物，因而选择牧场首先要由饲养的家畜种类决定。但是，假如在同一片草场上长期放养同一种家畜，就会导致某一种植物的退化；而且同一类畜群排泄物的长期积累，不仅不会成为肥料，相反会对土壤和植被带来负面影响，并可能增加家畜传染病发生的机率。犹如农业的轮作一样，草原同样

①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会编印：《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215—216页，1988（2）。

② 《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5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也需要轮牧。正是基于保护自然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的双重目的，游牧式的畜牧业才成为古代北方民族首选的生产方式。^①

游牧民族饲养的家畜主要是马、牛、绵羊、山羊、骆驼，蒙古族习惯称之为“五畜”。在不同的时代，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各种家畜的比重又有所差别。在清朝以前，由于战争频繁，马匹作为战争物资，在北方民族和中原地区需求量较大，牧民根据战争和商品交换的需要，大规模养马，以回鹘为例，他们除满足10余万士兵战马需求外（按蒙古帝国时期士兵每人需战马3匹~4匹的习惯计算，10余万士兵就需马30万~40万匹战马），同时每年还用数万匹马与唐朝交换缯绢，持续近20年，^②可以想象回鹘人拥有的马匹数量是惊人的；辽代在各地开设了诸多官马场，据1065年统计，马场的马匹总数达100万匹之多，^③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民间的马匹；《史集》称成吉思汗的高祖母莫孛伦的马群覆盖了山谷。牧民饲养牛主要是为了役使和解决奶食品，因此牛的数量相对较小。骆驼的饲养数量，在清朝以前也是有限的，《史记》中提到匈奴人的“奇畜”中就有骆驼，《蒙古秘史》中也有以驼驾车的记载。蒙古族大规模饲养骆驼似乎与清代旅蒙商以骆驼作为主要运输工具有直接的关系，沿商路地区骆驼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牧区。山羊的数量在牧民家畜总数中一般占有较小的比例，由于山羊活动能力较强，且耐粗饲，故多为荒漠草原地区牧民所饲养。绵羊在传统的牧

① 后藤十三晃：《蒙古游牧社会》，布林译，第24页，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史研究会编印，1992。

② 《新唐书》卷二一七。

③ 《辽史》卷一〇八。

业中，是牧民主要饲养的家畜，是肉食和绒毛制品（如毡子）的主要原料，所以数量较大。南宋赴蒙古的使臣徐霆通过观察认为，13世纪初蒙古族畜牧业的家畜饲养比例为“有一马者必有百羊”。这里所说的羊主要是绵羊，其数量是可观的。

牧场是游牧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生产资料，牧场的面积、植被质量（单位面积内的产草量和植物的品种），直接制约着畜群的繁殖速度。蒙古高原基本上属于干旱型草原，按地貌可细分为平原草原、荒漠草原和山地丘陵草原；以植物区分，又可分为禾本植被草原、蒿属类草原和非菜类草原。^①

受地理、语言以及信息不畅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古代部分中原人士认为游牧民族的社会经济是纯粹单一的经济，除畜牧业之外，别无其他任何产业，如汉代桑弘羊在《盐铁论》中认为，“匈奴无城郭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廩库府之积，上无义法，下无文理……织柳为室，旃为盖，素弧骨，马不粟食”。认为匈奴既无城市建设，也没有手工业和农业。13世纪的南宋人徐霆说道：“霆尝考之，鞑人初始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其国除孳畜外，更何所产？其人稚朴，安有所能？”^②他认为当时的蒙古人除放牧之外，别无所长。相关的史料和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古代游牧民族除从事畜牧业之外，还从事规模不等的狩猎业、农业和手工业，以及颇具规模的商业贸易，补充生产、生活之需。

农业。从考古资料我们得知，史前的贝加尔湖地区，蒙古

^① 后藤十三晃：《蒙古游牧社会》，第22页。

^② 《史记》卷一一一。

高原腹地，鄂尔多斯、科尔沁地区都曾存在农业生产，其中，红山文化的农业生产是比较发达的。那么，随着游牧经济的确立，农业是否被牧民彻底放弃了呢？

公元前119年，汉卫青以轻骑追击匈奴至北窋颜山，“得匈奴积粟食军，留一月，烧其余粟以归”^①。汉军数万人吃了一个月，而且还有剩余，这说明匈奴已建设了庞大的粮库，没有相应的农业生产，就不会有如此规模的粮食储备。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材料可知，乌桓、鲜卑、柔然、黠戛斯、契丹等民族都曾从事过农业生产。与蒙古族有着渊源关系的室韦、塔塔儿、克烈、汪古等部族也有从事农耕的记录，因此，从匈奴至蒙古族，所有的游牧民族在从事畜牧业的同时，也从事着农业生产。农业作为畜牧业的补充，在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中，其规模或大或小，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始终占有一定的比例。

冶炼和手工业。冶炼业在古代社会经济中是“百工”之首，学术界通常用“青铜器”、“铁器”的使用来界定社会进步水平。北方游牧民族的冶炼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发展与中原地区是同步的。

“1976年，在赤峰市林西县大井村，发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古铜矿遗址。这个铜矿遗址包括露天开采、选矿、冶炼、铸造等全套工艺的遗迹，共发现矿坑40余个、炼炉8座，以及许多陶制鼓风管、陶范和炼渣，还有1000余件开采铜矿的工具，

^① 彭大雅：《黑鞑事略》，徐霆疏证，王国维笺证。见《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